

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 对外党际关系调整的思考与实践

□张成乐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摘要]政党是一个国家内外政策的源头。中国共产党对外党际关系是党的一条重要战线,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亲自领导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党际关系的调整。邓小平不断解放思想,对党际交往原则进行了若干思考,形成了新型党际关系思想。在服务国家利益和总体外交的大局下,中国共产党同国外共产党恢复关系,同民族主义党、社会党建立关系,党际关系为总体外交发展和改革开放作出了有益贡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邓小平;对外党际关系;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5)05-0078-09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对外党际关系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邓小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领导中共同国外共产党恢复关系,同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党、西方国家的社会党建立关系。本文从中外互动的视角分析中共对外党际关系的发展变迁及背后的影响因素,揭示其对改革开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总结中共对外党际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

一、中共对外党际关系调整的缘起

早在建党之初,中共就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努力争取国际社会及进步力量的理解和支持。新中

国成立后,中共对外党际交往不只是党领导下的一条重要战线,也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中共积极发展与国外共产党、工人党等进步力量的关系。这不仅有助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扩展国际发展空间,而且为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1966—1976年间,受政治局势的影响,中共对外党际关系的发展进入低谷期。因此,中共对外党际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调整是对外工作拨乱反正的题中之义。

其一,总结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对外党际关系发展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对外党际关系不仅对国家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也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助推作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对外党际关系的发展较为

[收稿日期]2025-04-21

[作者简介]张成乐(1992—),男,山东聊城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新中国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科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中共党史党建资助计划(项目编号:DF2023ZD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顺利。进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共对外党际关系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对外交往的局面逐渐恶化。其中,中共同国外绝大多数共产党的关系先后中断。加之,自1966年起,康生开始负责领导中共对外交往工作。^{[1]P32}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康生为中共对外工作制定了“支左反修”的方针。^{[2]P206}这给中共对外党际交往工作的开展带来了诸多障碍。

对此,毛泽东和周恩来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加以纠正。毛泽东多次批评了在对外宣传工作中“左”的表现和将毛泽东思想绝对化的做法。1970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下简称中联部)上报的《关于邀请荷兰共产党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作出批示,要求“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P42}周恩来在外交工作中做了大量批判极“左”思潮的工作。1971年初,周恩来要求中联部整理毛泽东关于外宣工作的批示,并印发党内供学习参考。^{[1]P42}这是使党内极“左”思潮降温的有力举措。1971年7月,耿飚受命担任中联部部长,党的对外工作在艰难曲折中逐步采取了一些恢复性措施。比如,1971年10月,在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率团访华期间,耿飚会谈时提到不要“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各党应制定“自己的路线”。^{[2]P209}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对外党际交往的经验教训值得深入反思和总结。1976年,中国迎来了历史性的重大转折。中共在对外党际交往工作中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反思极“左”思想给对外关系造成的危害。1979年初,中联部召开扩大会议,认真讨论了受“四人帮”的扰乱,党的对外工作中存在的是非问题。1979年2月,中联部向中共中央上报《建议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请示》(以下简称《请示》)。《请示》指出,“建国20多年来在党和国家的对外工作中,根本不存在一条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路线……强加在王稼祥同志和其他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该推翻”^{[3]P108}。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给予了支持。随后,中共中央批准中联部将《请示》以《中央联络部文件》的形式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了通报。这一拨乱反正之举,有力地带动了中共对外党际交往新局面的开

启,对调整中共对外党际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其二,中国迎来历史大转折,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百业待兴。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不断深入,中国国内对极“左”错误路线的认识也逐渐加深。^{[4]P2}1978年开始,中国步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国内稳定形势、经济发展需求等因素的影响下,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关注的重点开始逐渐转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5]P178}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主持制定现代化规划,并派高级代表团出国考察国外发展经验。这些变化都为中共对外党际关系的初步调整创造了相对宽松的大环境。

随着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渐向经济建设转移,整个国家迎来了大转折。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重要讲话。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是当时完成四化的“重大政治问题”,要打破“思想僵化”的局面,从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表示,处理“文革”时期的遗留问题就是为了“向前看”,为了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更要“向前看”。^{[6]P141-149}这实际上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对改革开放的起步发挥了极为关键的推动作用。虽然该报告未专门就外事工作作出论述,但其所蕴含的打破“思想僵化”的方针逐渐影响到对外工作。当然,这是一个逐步调整,循序渐进的过程。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明确指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7]P15-16}。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愈加敞开。中共对外党际交往自然也需要为改革开放服务。1977—1978年,为了拓宽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国际视野,中国领导人掀起了出国访问的热潮,促成了对外开放战略决策的形成。^{[8]P24}

1978年是邓小平出访次数最多的一年。1978年初,邓小平访问缅甸和尼泊尔,9月访问朝鲜,10月下旬访问日本,11月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邓小平亲自出访所获得的见闻,以及其他高级别考察团的汇报,均对他在思考中国对外政策

和改革开放的重大议题时产生了促进作用。例如,1978年2月4日,邓小平同尼泊尔首相比斯塔会谈结束后,在谈到南亚形势问题时提出,“我们希望南亚所有国家不论大小,都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互不干涉内政”^{[9]P265}。又如,同年9月12日,邓小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会谈,在谈到引进技术发展经济问题时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9]P372-37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立足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外关系发展两个大局,亲自定政策、把方向、见外宾,直接领导中共对外党际关系的调整。这与邓小平曾经主管中共对外工作有很大关联。比如,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过程中,邓小平作为中央领导人十分反感苏共的“老子党”做派以及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10]P197}。从这时起,邓小平便注意反对国际共运中不平等的党际关系。又如,在处理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文中简称南共联盟)、意大利共产党(文中简称意共)等党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持积极态度。在恢复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不断总结对政党交往原则的新经验。这对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提出具有直接影响。

概言之,党际交往经验的总结,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对外党际关系的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最关键的是1978年底,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国家发展战略转变成为中国外事工作的主要动力。党的对外工作逐渐受到工作重心转移的影响,并与国家外交的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上述因素构成了中共对外党际关系调整与发展的结构性背景。

二、邓小平对中共对外党际关系调整的若干思考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如何看待党际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如何把握新时期国际共运的特点,以及如何处理党际关系等问题,成为摆在邓小平面前的难题。只有不断解放思

想,破除对外党际交往中条条框框的限制,才能正确推动对外党际交往的发展。

(一)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关于对外党际关系的思考主要从拨乱反正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很多新认识

如何看待党际关系中的历史问题。邓小平主张在党际交往中不纠缠历史问题,要向前看。1977年9月,邓小平同缅甸总统吴奈温举行会谈时提到,“铁托这次访问很成功。过去我们吵过架,现在双方都说过去的事算了。我们谈得很好,双方的关系有较好的发展”^{[9]P202}。这一思想不仅对党际交往有指导作用,而且延伸到国内拨乱反正的问题上。1977年12月,邓小平听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汇报,指出揭批“四人帮”应“注意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要和一切犯过错误而改正了的同志团结起来,问题就容易解决。纠缠历史问题,算历史旧账,会改变政治方向,这不符合毛主席的政策”^{[9]P248}。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打招呼会议上强调“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9]P445}。不纠缠历史问题是为了轻装上阵,更是着眼于新时期的顺利发展。

关于评判国际共运是非曲直的标准。邓小平总结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提出评判国际共运中的是非曲直只能依据本国的实践。1980年5月,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提到“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6]P318-319}。

关于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区分。吸取中苏两党关系恶化对两国关系造成严重影响的教训,邓小平将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辩证看待,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1978年3月,邓小平在给苏联驻华使馆照会上批示“中国方面愿意看到的,不是什么空头声明,而是货真价实的行动”^{[9]P275}。面对苏联对中国的攻击、指责,邓小平主张不争论。党

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界限逐渐明晰起来。此外,合理区分两种关系更体现在邓小平领导中共对东南亚共产党关系的调整中。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泰国期间指出,“把党和党的关系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区别开来,使这样的问题不影响我们发展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并主张逐渐解决同东南亚共产党关系,“这样的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既然是历史形成的,就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9]P422}邓小平的表态展现了诚意,对中国发展同东盟的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如何处理同兄弟党的关系。回顾国际共运的发展史,处理兄弟党关系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国家关系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邓小平思考怎样处理同兄弟党的关系有启发作用。1977年10月,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说:“我们对邻国,哪怕是社会主义国家,也都采取不干预别国事务的政策”,“这是我国的根本方针”。^{[9]P217}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新加坡时提到,“我们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9]P427}。邓小平亲自参与了国际共运的许多事件,对苏共“老子党”“大党”作风造成的危害深有体会。为此,邓小平提出同兄弟党之间要平等相处、互不干涉。1980年11月,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时提出,“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党关系,不是父子党关系”,“党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9]P692}

(二)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邓小平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基础上,针对党际关系如何为国家外交和改革开放服务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了关于党际关系发展的新论断

如何看待同外国党的思想理论分歧。从中共对外关系史看,中共同外国党在思想、理论、政策、理念、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实属正常,而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例如,虽然国际共运大论战的爆发存在很多内外因素,但没有合理看待、管控同外国党的思想理论分歧也是一个关键因素。1980年4月,邓小平提出,“我们在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时,总的来说是清醒的。但是回过头看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6]P319}1980年11月,邓小平深化了自己的思考,明确提出“现在回过头看,我们过去并不都是对的,错误也不少”。^{[11]P174}1984年3

月,邓小平明确指出,“还是按照中央已经定下的方针办。政治问题上要维持和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是对是错,由他们自己去判断”。^{[12]P264}对于分歧,要以求同存异为原则,但求同存异并不代表丧失立场。

如何认识国际共运的“中心”问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以实际行动同南共联盟恢复关系,从而打破了在国际共运中的相对孤立状态。其后,中共处理对外党际交往更加独立自主。1983年1月,邓小平会见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时提出,“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会谈我是一直参加的,多数是我当团长,对手主要是苏斯洛夫,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我们有我们的一套”,“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的那套东西是不行的,中心就是发号施令、以他们为主。我们有些东西今天看来也站不住脚。现在有两个问题他们还没有搞通,一个是平等相处,一个是独立自主。平等就是没有老子党。老子、儿子的关系实际上是否认了独立自主”,因此“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只有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道路和走这条道路的方式,这就是独立自主”。^{[12]P178-179}

如何看待党际交往中的意识形态差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破冰。这体现出中国国家外交的发展已经存在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差异的因素。其后,毛泽东倡导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从理论层面确认了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发展国家关系的合理性。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新加坡时明确提到,“我们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11]P91}。国家关系中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差异,为中共破除意识形态限制,同社会党、西方中右翼政党交往提供了思路借鉴。1984年5月,西德社民党代表团访华期间,中共中央提出了在党际交往中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的主张。这赢得了广大社会党的赞誉,也为中共对外党际交往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关于如何看待各国政党探索发展新道路。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82年1月,邓小平会见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穆罕默德·哈吉·亚拉率领的代表团,提出“要根据本国的特点制定发展政策。只要政策符合实际情

况,经济发展就可以快一些”^{[12]P93}。1982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时明确提出,“每个党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欧洲问题欧洲人最了解,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人家犯了错误,让人家自己去改正”。^{[12]P113}同年10月,邓小平会见了乔治·马歇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再次提出“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党自己独立处理”。^{[12]P161}提出各国党应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是中共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三)从党的十三大到南方谈话前后,面对苏东剧变、国际共运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邓小平提出不当头、不扛旗、不搞争论,形成了关于党际关系发展的新思考,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苏东剧变之际,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道路。1989年,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改革进程也陷于停滞。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成了严峻考验。在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提出中国不要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89年9月,邓小平在同江泽民、李鹏等谈话时提到,“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还要“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并强调“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12]P585}只有坚持搞改革开放,牢牢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才不会被压垮。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他们总是能够在历史转折关头指出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在邓小平领导下,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最终捍卫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也是中共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

关于捍卫社会主义的方针。苏东剧变是一次对中共的全面考验。面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要求中国当头、扛旗的诉求,邓小平非常理智地作出了不当头、不扛旗的决定。1989年9月,邓小平同身边人员谈国际问题时指出,“切不要打旗,不要去干涉别国的事情。关键是自己要搞好,自己搞好了,本身就是对国际共运的贡献,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12]P584}同时,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渡过国际共

运危机的方针:“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只要“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13]P321}不当头不是毫无作为,而是坚持正确的方针有的放矢。

对于同苏东地区政党交往的问题。东欧剧变开始后,诸如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纷纷垮台,同时涌现出新的政党。如何处理同这些党,尤其是同其中执政党的关系,成为中共面临的一个难题。求同存异,不搞争论为中共冷静观察东欧共产党垮台后的应对指明了方向。邓小平主张先冷静观察,继而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指导下发展关系。在东欧共产党垮台的同时,苏共尚未出现根本性变化。如何处理同苏共的关系,也是一大难题。1990年3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认为,国际新格局尚未形成,中国“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3]P353}只有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才能为冷静观察、分析国际格局提供良好条件。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邓小平冷静观察国际形势,准确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对党际关系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形成了新型党际关系思想。正确的思想是实践的有力指导。新型党际关系思想是中共对外党际关系调整、发展的指导方针,为新时期中共对外党际关系发展以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中共对外党际关系调整的实践与对外关系的拓展

思想解放是实践突破的先导。在邓小平关于中共对外党际关系调整的若干思考不断成熟的同时,中共对外党际关系也在进行调整。这一时期,中共先后同国外共产党、民族主义党、社会党恢复或建立了党际关系。这有力地配合了国家对外开放的步伐,并为国家总体外交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一)中共对外党际关系的初步调整

1976年10月开始,中国政治局势开始出现大

的转折。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共对外党际关系也开始了初步调整。受“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构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中共同南共联盟的关系最早实现了突破。1975年10月,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主席比耶迪奇应周恩来邀请访华。10月8日上午,毛泽东接见了比耶迪奇,并赞扬铁托说:“Tito,中文是铁托,铁托就是iron……不怕苏联压迫”。^{[14]P88}毛泽东对铁托作出肯定性的认可,减轻了中南两党关系缓和时的阻力。

1977年4月,中国决定邀请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华。同年9月1日,中南领导人举行高层会谈。华国锋直接表示,近年来两国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共同点越来越多,“两党可以先恢复内部联系,经过双方努力,再正式恢复关系”。^{[15]P137}邓小平表示:“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14]P77}这都超出了铁托的预料,便表示:“十分高兴听到中方对两党关系问题的意见,赞同向前看的思想”^{[16]P331}。此访标志着国际共运中所谓“南斯拉夫问题”的终结,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铁托回国后,南共联盟对发展同中共关系持积极态度,决定要进一步建立联系。1978年6月,中南两党终于恢复了关系。这重新树立了中共开放、包容、自立、自强的良好形象,同时也赢得了西方部分国家和部分国外共产党的好评。同时,有助于为国内改革提供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舆论环境。

中南两党关系正常化为下一步中共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政党建立关系做了一定程度的铺垫。1978年前,中共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同世界上许多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保持着友好关系,而不同其他性质的政党接触、交往。从1978年开始,为了进一步构建反霸统一战线,以及受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记忆等因素的影响,中共开始正式同第三世界国家政党建立关系。

(二)中共对外党际关系的进一步调整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始终持同情态度,也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对外关系更加强调以亚非拉第三世界为基础,联合第二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这对新一届中国领导人的影响不容忽视。同时,美苏两国在非洲等地的干涉日益频繁,这使

得非洲、拉丁美洲的反帝反霸运动日渐高涨。随着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潮,中国越来越重视与第三世界的关系。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巴基斯坦政府首脑齐亚·哈克时指出,“根据毛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规定,我们以第三世界为主力军,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包括第二世界的力量,反对两霸的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9]P247}

197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同非洲地区政党建立关系一事。对此,邓小平明确表态给予支持。会后,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南部非洲等地区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执政党要求与我党建立关系问题的请示》。

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以下简称索革社党)成为与中共最早建立党际关系的非洲民族主义党。^{[17]P51}早在1976年7月,索革社党成立不久,西亚德来电要求同中共建立党际关系。由于当时只同马列主义政党来往,所以中共暂时未予置理。1978年4月,西亚德来访时,其再次提出同中共建立关系的要求,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欢迎宴会,并与其进行了多次会谈。^[18]随同西亚德来访的索马里副总统、革社党助理总书记伊斯梅尔遂同中联部部长耿飚进行了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建立友好联系。^{[2]P220}至此,中索两党正式建立两党关系。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审慎研究拉美民族主义党情况后,首先选择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以下简称墨革制党)建立联系,进而建立党际关系。作为第一个同中共建立关系的拉美地区民族主义党,其反对“一切政治和经济的霸权主义”,在拉美政治舞台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力。^{[19]P4}1979年3月,中联部副部长申健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该党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这是两党间首次交往。墨革制党领导人卡瓦哈尔表示十分高兴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来访,认为来访为两党交换意见、加强联系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以此为起点两党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得到顺利的发展。此访标志着中共与墨革制党关系的正式建立。

经过数十年调整与发展,中共同数十个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党建立了党际关系。^{[17]P59}除了民族主义党外,如何处理同第三世界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也是一大考验,尤其是同东南亚共产党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国家发展战

略开始转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给外事工作提供了强大动力。这也是中国调整同东南亚地区政党关系的根本动力。同时,随着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和发展秩序都迎来一个大转折。这些因素都是中共同东南亚共产党调整关系的背景。

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掌握了同东南亚共产党调整关系的主动权。其中,邓小平的出访有着重要作用。1978年3月,邓小平在出访泰国时表示,发展同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真诚的愿望”。^{[9]P289}对同泰国共产党等党的关系,邓小平提出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分开处理的方针。^{[9]P422}这一政策得到长时间的执行。在服从国家外交需求的情况下,中共积极调整同马来亚共产党、缅甸共产党、泰国共产党等党的关系,历经十年才得以基本完成。与此对比,中越两党关系则毫无起色。随着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启,中越关系正常化的条件才逐步成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访华为标志,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实现完全正常化。^[20]

在同南共联盟、第三世界国家政党发展关系后,同西欧共产党恢复关系,就成为中共对外党际交往亟须解决的议题。受“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影响,团结西欧对中国来说十分必要。1978年6月,西班牙国王来访,邓小平指出中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联合的、团结的欧洲”^{[9]P327}。随后不久,法国巴黎市长希拉克访华,邓小平再次表示中国历来赞成“有个强大的欧洲、联合的欧洲”^{[9]P389}。这代表了中国最高层对发展同西欧关系的态度。

中共同意大利共产党(简称意共)关系正常化成为突破口。1980年4月,意共中央总书记贝林格访华。怎么看待两党关系中的纠纷,成为中意两党领导人会谈的焦点。邓小平表示,中意两党关系恶化已有十五年之久,虽然“过去吵架”,但“没关系,统统作废,一起烧掉”,尤其是面对两党的不同意见“不要紧”,“有些问题要通过实践加以检验”。^{[11]P153}紧接着,邓小平的表态可谓一锤定音,他谈了三点主张,即“一是过去的一切一风吹;二是当时有些问题我们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错误;三是我们双方统统向前看”^{[11]P153}。这三点主张一方面体现出邓小平的豁达和乐观,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在释放中共中央诚意的同时,还规划了两党关系的未来——要“向前看”。其后,中共接连同西

班牙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等诸多西欧共产党恢复政党关系,进一步扩大了中共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

(三)中共对外党际关系的顺利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邓小平一方面领导国内改革开放宏伟事业,另一方面为对外关系调整擘画航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方向,逐渐影响到外事工作领域。由此,中共同西方社会党建立关系的条件逐渐成熟。1981年初,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访华,推动法国社会党同中共建立关系。中法两党关系的确立,为中共同社会党发展关系作出表率。随着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广泛适用,中共中央对处理同外国社会党的关系时,阻力越来越小。此后,中共同西德社民党的关系逐渐升级。这和两国国家关系发展以及中国国家发展战略有密切关系。中共中央对西德社民党政策的判断以及二者的互动,决定了两党关系的最终走向。

1984年夏,西德社民党主席勃兰特访华,加速了两党关系的确立。这不仅在两党关系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而且为中共同更多社会党乃至社会党国际交往打开了大门。政党交往促进了国家关系的向好发展。简言之,中共同西方社会党建立关系是中国同西方关系演变的一个缩影。这一过程持续了数年之久,邓小平增加了一条了解西方社会发展和沟通经贸合作的渠道。通过政党交流,中共对外工作逐渐超越意识形态界限,为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不少经济建设的经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如何处理同苏东共产党的关系,成为邓小平需要考虑的一项议题。中共同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关系迟迟未见改善,很大程度上和中苏国家关系的长期僵持有密切关系。1982年3月,苏联释放对华善意。在邓小平领导下,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启。这包含了党际关系正常化的议题。1986年7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表达了对华善意,认为两国关系近年来有了“明显改善”。^[21]1987年5月,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托·日夫科夫正式访华,受到邓小平的亲切接见。邓小平坦率地表示,这是一次“老战士的会晤”,对之前两党发生的“纠葛”,要想办法“结束”。邓小平还以铁托访华为例,说明中南关系处理此类问题是采取“对过去的问题

一风吹,一切向前看”的办法,得到日夫科夫的“完全”赞同。^[22]无独有偶,同年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访华。谈到两党过去的纠纷时,邓小平直接表示,“过去的问题一风吹”^{[13]P256}。短短数年中,中共相继同保共、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波兰统一工人党、东德统一社会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恢复了关系。

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外宾时指出,中苏关系正常化不只是国家关系,“自然”还有两党关系问题。^{[12]P548}1989年5月,邓小平同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举行会晤。邓小平以中苏关系亲历者的身份梳理了中苏关系的恩恩怨怨,对这些“历史账”,他主张“一风吹”,也就是要“结束过去”。^{[13]P295}戈尔巴乔夫对此深表赞同,双方同意就这样“结束过去”^[23]。关于中苏关系的发展,邓小平认为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中苏两国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形成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关系,所以要“开辟未来”^{[13]P294}。“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重要思想凝结了他长达十余年的连续思考,极具思想价值。总之,中共对外党际交往有力地配合了国家外交的需要,为扩大对外开放和国家总体外交服务。

四、结语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共对外党际关系实现了顺利调整并取得进一步发展。纵观从新中国成立到冷战结束,中共对外工作走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对比前后两个阶段中共对外工作发展的基本经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对外工作在四个方面实现了突破性的转变:第一,在指导思想方面,实现了从“支左反修”到以国家利益为导向、为国家总体外交服务的历史性转变;第二,在交往原则方面,实现了从“以我为主”到以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为指导的突破;第三,在交往对象方面,由只同国外共产党、工人党交往,到跨越意识形态界限,同世界各国主要政党展开正常交往;第四,在交往内容方面,实现了由“支左反修”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跨越式转变。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既不是走老路,更不是走邪路,而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命题植

根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实践,同时也离不开党际渠道的交流互鉴。党际交流互鉴对中共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模式发挥了重要的镜鉴作用。其中,中共同国外共产党的交流为中国突破传统社会主义认知提供了重要参照。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13]P3}这一命题指出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发展的主题。纵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苏东各国和中国的改革事业机遇与风险并存,但只有中国成功走出苏联模式,并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本文以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对外党际关系调整的思考与实践为研究对象,从新型政党关系理论视角探讨其当代价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党际关系思想创造性地构建了“超越意识形态差异、服务国家利益”的双重实践范式,对新时代中共同世界政党交往有着重要理论启示与现实指导价值。其一,在实践维度,要始终眼光向外,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加强同世界政党的交往合作。该思想体系首先确立了开放型政党外交原则,通过构建“不以制度划线、不搞价值输出”的对话合作机制,成功破解了冷战思维桎梏,为改革开放营造了有利外部环境。其二,在理论维度,要始终坚持为国家总体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导向,积极开展党际交流互鉴。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共对外党际关系转变到为国家利益、为改革开放服务上来,建立了政党外交与国家总体外交的协同机制,将党际交往深度嵌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思想遗产启示我们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同时,既要坚持以意识形态划界,不以大小强弱论亲疏,不搞输出和说教,不强加于人,又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广泛同世界各国各类型合法政党和政治组织开展和深化对话交流、友好合作。通过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拓展全球治理议题合作,使党际关系成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战略支点。这种历史逻辑与现实需求的辩证统一,不仅彰显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的继承性与创新性,更为破解全球政党治理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 [1]宋涛.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100年[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
- [2]孔祥琇.耿飚传:下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
- [3]王家瑞.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3.
- [4]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四[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 [5]萧冬连.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8]赵进军.中国外交官与改革开放[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第四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10]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第五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4]刘宝莱.共和国外交往事2[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
- [15]郭业洲.长风破浪会有时: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九十年纪实[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6.
- [16]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联部四十年:1951—1991[M].北京:人民画报社,1992.
- [17]艾平.双洲记:政党国际交往亲历[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8.
- [18]李先念.在国务院举行的欢迎西亚德总统的宴会上李先念副总理的讲话[N].人民日报,1978-04-15.
- [19]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拉丁美洲研究所.拉丁美洲各国政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 [20]新华社.中越发表联合公报[N].人民日报,1991-11-11.
- [21]新华社.戈尔巴乔夫谈苏联对亚太地区政策[N].人民日报,1986-07-29.
- [22]严正,张健.邓小平亲切会见日夫科夫[N].人民日报,1987-05-08.
- [23]周象光,温宪.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 邓小平昨天同戈尔巴乔夫会晤 双方宣布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N].人民日报,1989-05-17.

DENG Xiaoping's Thoughts and Practices on Lea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Adjust International Inter-party Relations

ZHANG Chengl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A political party is the source of a country'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International inter-party rela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re an important front for the Party and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untry's overall diplomacy. During the new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ENG Xiaoping personally led the adjust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inter-party relations. DENG Xiaoping constantly liberated his mind and conducted several reflections on the principles of party-to-party interactions, thereby forming the concept of a new type of party relations. Under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serving national interests and conducting overall diplomac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stored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mmunist parties and established ties with nationalist parties and social parties. These inter-party relations have made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overall diplomacy and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rocess.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NG Xiaoping; international inter-party relations; reform and opening-up

(责任编辑:肖文初)